

张大千(1899年-1983年),四川内江人,原名张正权,又名爰,字季爰,号大千,别号大千居士。他曾亲赴四川夹江,与当地造纸人一道改进技术,成品“大千纸”从此名声大噪。2006年,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张大千改良夹江纸 留给今人一项国家级“非遗”

安徽宣纸来源断绝 张大千赴夹江寻纸

张大千绘画、书法、篆刻、诗词无所不通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都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。20世纪20年代,他与其兄张善子创立“大风堂画派”,俗称“大千画派”,被称为中国画坛的“蜀中二雄”。20世纪30年代,他与北方大画家溥儒(心畲)齐名,被称为中国画苑的“南张北溥”,张大千被中央大学聘为艺术教授。1949年后,张大千旅居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国等地,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,被西方艺坛赞为“东方之笔”。

敦煌学,作为一门“显学”,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。陈寅恪先生在序陈垣《敦煌劫余录》中有言:“一时代之学术,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。取用此材料,以研求问题,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。治学之士,得预于此潮流者,谓之预流。其未得预者,谓之未入流。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,非彼闭门造车之徒,所能同喻者也。”

依陈寅恪的观点,张大千当属“预流”。早在1939年,张大千便将艺术的目光锁定了敦煌。他筹措经费,备办纸张、颜料,准备到敦煌,攀登绘画艺术新峰。殊不知,偌大一座成都城,竟买不到绘画用的宣纸。当时,侵华日军已经占领安徽泾县,宣纸来源断绝。张大千着急地找到“诗婢家”装裱店的老板郑伯英帮忙想办法。郑伯英告诉他,安徽宣纸眼前是弄不到了,只有四川夹江的粉连四纸。先生何不一试?

夹江造纸始于唐,继于宋,兴于明,盛于清,有一千多年历史,素以质量佳、技术精、品种多、宜书宜画、历史悠久而载誉巴蜀。明代《蜀中名胜志》记载:嘉



夹江手工造纸博物馆。周德平 摄

定尖山下皆纸房,薄如蝉翼而质坚可久。清康熙时期,夹江纸中的“方细土连”“长帘文卷”更成为“贡纸”和“文闾卷纸”,每年上贡十余万张,用于皇室家族和科举考试。然而到了清末民国初年,受西方造纸、印刷等新技术冲击,夹江造纸渐渐落后于时代,工艺不得改进,规模不得提升,诸多造纸者纷纷破产。直至抗日战争爆发,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地区对纸张需求激增,夹江造纸方才有了再次勃兴的契机。1939年冬,张大千来到夹江寻找画纸。

石子清,夹江手工造纸大户,声誉很高,其作坊位于夹江县马村乡石堰村。张大千到来时,石子清已去世,作坊由其子石国良主持。用惯了安徽宣纸的张大千,试用了几张石国良的“作坊纸”,皱起了眉头:纸韧性较差,抗水性不强,洁白度也不够。于是,大千先生在作坊住下来。蹲窖池、看沤竹、捶

竹料、上篁锅、辨帘纹、捣石臼、上纸榨、刷纸、切边角……张大千找到了原因:当时的夹江连四纸全部用纯竹料制作,所以有上述缺点。张大千遂同石国良商量,改革原材料搭配,在竹料中加入寸把长的棉、麻纤维,以增强纸的拉力,在纸浆中配入一定比例的白矾、松香等,以增强纸的抗水性和洁白度。经反复试制、试写、试画,新一代夹江国画纸问世了。

用夹江纸临摹敦煌壁画 “大千纸”由此闻名全国

张大千根据绘画的需要,亲自为夹江国画纸定下了大小规格(四尺乘二尺、五尺乘二尺五寸);亲自设计了宽纹纸竹帘,并巧妙地制成暗纹,印在纸上;在纸的两端做云纹花边。经过改进,画纸拉力增强,可承重笔,洁白细腻,浸润性好,书画皆宜。当然,制作这种纸张

要比一般纸费时费工。“只求有纸用,何惜出重金。”张大千以五六倍于普通纸的价格,第一次就向石国良定购了两万张。

1940年春,张大千再次来到夹江,验收石家作坊所制之纸。不久,他带着夹江生产的书画纸去到甘肃敦煌,率领他的画友、学生、子侄,对敦煌的古代壁画进行了大规模临摹。经两年半的辛苦劳作,共临摹南北朝、唐、五代绘画作品276件。这批艺术品先后在成都、重庆展出,轰动一时。大千先生用他的神笔,用夹江纸艺术地再现了敦煌画作,徐悲鸿、柳亚子、于右任、叶圣陶等对此推崇备至。

“大千纸”也由此闻名全国,并与安徽宣纸并驾齐驱。张大千曾将夹江手工纸与安徽“玉版宣”纸相媲美,赞为“国之二宝”。2006年,夹江竹纸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抗日战争时期的“书画乐山”精彩纷呈,何止于此。著名画家张善子、黄宾虹、齐白石、徐悲鸿、张大千、傅抱石、黄君璧、李可染、吴冠中、程十发、关山月、冯建吴、丰子恺、方成等来乐山,或寓居,设堂授徒,或旅游交流,采风创作,传递艺术精髓,留下了大量珍贵作品。随后的数十年间,乐山本土画家李琼久、李道熙等承继宋元文人画传统,拜大自然为师,以独特的猪鬃笔为工具,以“三山三江”(乐山、峨眉山、凉山,大渡河、青衣江、岷江)为依托,以绘画抒发个人的性灵和情愫,并融入文学、书法素养,自辟蹊径,形成“雄奇峻秀、含蓄深沉、气势超绝、飘逸空灵、笔墨生辣、色彩分明”的独有风格,奠定了在四川山水画发展史上的地位。著名画家李苦禅、黄永玉等将这种放逸的画风命名为“嘉州画派”。

文图来源: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令范仲淹称奇的名儒何济川



《民国新修南充县志》对何济川有记载。

宋仁宗时,四川果州南充县(今南充市)出了一位深为范仲淹敬重的饱学之士——何济川。济川名涉,自小熟读六经、诸子百家,还广泛阅读了地理、医卜之书。他的记忆力特强,有人向他请教书中的事,他能说出在某书某卷某一页上,去验证往往丝毫不差。

何济川考中进士后,先被派往陕西洛交县作主簿,后升任中部县县令。范仲淹同他见面,一席交谈,便深为他渊博的学识称奇,于是上奏朝廷,让何济川做了彰武军节度推官,到自己的军营中任职。不久何济川就升著作郎,在军中参与谋划、培训将士,出过很多力,深得当时军事长官范仲淹和庞籍的赏识。后庞籍奉诏回京任枢密使,他请何济川一同回京任职。何济川说,家中父母年事已高,希望能允许他回家奉养老人。不久,朝廷下诏,任何济川为秘书丞、眉州通判,后改任嘉州通判。经当时大儒文彦博和庞籍举荐,何济川奉诏进京,出任集贤院校理。后来,何济川又向朝廷请求还乡,于是调任汉州知州,改任合州知州,其后又升任尚书司

重视教育,凡他任职处,皆致力修建学馆,亲为学子讲授。在军中供职时,也专为将士开讲《春秋左氏传》。宋代名将狄青当年就在军帐中听过他讲经。

《民国新修南充县志》载有何济川在汉州做官时,应地方乡绅所请,为当地写的两篇《记》。

一篇是《糜枣堰刘公祠堂记》,写于北宋庆历六年(1046年)。文中记述了唐代益州刺史高骈在成都郊外修筑糜枣堰护卫城区安全。到北宋初年,堰堰破损,成都遭遇严重水灾。唐代开宝元年(968年),端明殿大学士、兵部侍郎刘照古出任成都府尹,出动军队重修糜枣堰,使成都重新远离水患近八十年之久。至北宋庆历年间,堰堰因长年遭江水浸蚀,已是隐患重重。时任成都知府文枢直,于庆历五年(1045年)筹款兴工再次培修堰堰,同时将旧堰上的神庙“龙堂”改建为“刘公祠堂”,以纪念刘照古当年重修堰堰造福一方的功德,并刻石为记,以此勉励后世地方官员多为百姓兴利除弊。

另一篇是《墨池准易堂记》,文中记

述西汉末年蜀中大儒扬雄(字子云)在锦官城西有一旧居,是他著述之所。旧宅及旁边的墨池,皆被后人辟为纪念地。直到唐末,年年皆有人到此瞻仰,追忆前贤。五代时,王建盘踞巴蜀,将子云宅建为仓库。直到北宋初,几乎无人知道这是子云故宅。宋太宗淳化五年(994年),川西地区爆发王小波、李顺起义。农民军攻打成都,一把火将这座仓库化为灰烬。起义失败后,官军又在这块场地上建成军营。直到北宋庆历七年(1047年),后来做过相国的文集贤出任成都府尹,成都中兴寺怀兴法师前往府衙,向文集贤详细说明子云故宅被毁经过,提请恢复这一古代文化遗迹的旧观。文集贤于是派人寻觅遗址,重新规划,兴工重建。刚开了头,文集贤又被召回京城。继任高侯续成其事。建成堂屋,名“准易堂”。恢复墨池,并在池中筑台,上建一亭,命名“解嘲亭”。周围植树栽花,成为世人观光瞻仰的胜地。庆历八年(1048年),何济川应约写成此记。

文图来源: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封员外郎。几年后,因父亲去世,依照王朝制度免官回乡守孝。从此,他就隐居乡间不出,终老林泉。

何济川为人忠厚,事亲至孝。一生